



*范我存女士與訪談者單德興合影。(余幼珊攝)

守護與自持：范我存女士訪談錄

訪談人：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日期：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地點：高雄市左營區光興街余府

前言

范我存女士有個很特別的名字，是來自留學法國的父親。她大半輩子守護著身兼作者、學者與譯者的余光中先生並照顧家人，六十年如一日，因此被張曉風譽為「護井的人」，黃維樑譽為「護泉的人」。此外，喜好文學與藝術的她也發展出個人的興趣，如攝影、鑑賞古玉、編中國結，也曾多年擔任高雄美術館志工導覽，二〇一七年底出版的《玉石尚：范我存收藏與設計》（臺北：九歌）結合了古玉與中國結，配上自撰的說明文字，正是多年藝術情懷的結晶。

她與她口中的「余先生」是表兄妹，在中國大陸便已相識，初中時接獲余先生寄來的譯詩，頗為歎服。後因時局動盪，先後來到臺灣，重續前緣。范女士自幼雅好文藝，余老師早年的成名譯作——海明威的《老人和大海》(Ernest Hemingwa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與史東的《梵谷傳》(Irving Stone, *Lust for Life*)——原作便得自她家。余先生在徵求她的同意後，將翻譯在白報紙上的《梵谷傳》文稿寄給她，正面是譯稿，反面是情書，她把謄抄好的譯稿寄還給余先生，送交《大華晚報》連載，兩人合力完成此事，允為文學史與翻譯史上的一段佳話。范女士婚後勤儉持家，照顧兩家長輩與四個女兒，讓夫婿無後顧之憂，得以數度出國留學與講學，開展文學志業。余先生於詩歌、散文、評論、翻譯四方面都卓有成就，全賴范女士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持與穩定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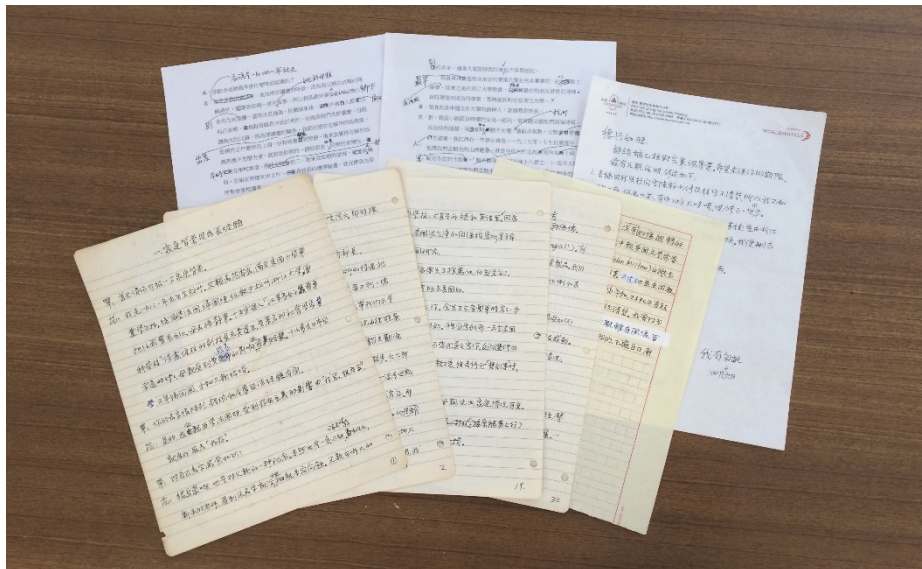
我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就讀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時，深獲余老師在文學與翻譯上的啟蒙，惟當時甚少見到師母，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他們自港返臺後，才較有機會見面。為了避免打擾，我平日甚少電話聯繫，但每逢前往中山大學，只要有機緣就拜望余老師，後來因為參加文藝活動較常見到老師與師母伉儷。眾人心目中的余師母個性爽朗，古道熱腸，帶有幾分俠氣，常對世情時事抒發己見。二〇一七年十二月我聽聞余老師再度住院，特地致電，師母說明發病始末與治療情形，並告知情況平穩，未料老師病情急轉直下，兩週後溘然長逝。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我赴國立中山大學參加「余光中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會議。這項研討會原為去年七月「余光中人文講座諮詢委員會」會議的決議，當時我因在哈佛大學訪學，先行告假。老師於十二月十四日與世長辭後，籌備委員決定依其生前規劃舉行學術研討會，但性質由原先的「壽慶」改為「紀念」。我於十二月二十九日赴高雄參加余老師告別式，彼時不便打擾家屬，因此趁今年三月將赴籌備會議，事先聯繫二女公子幼珊女士，表達希望登門拜望師母之意。後來考慮到眾人皆知師母為老師多年支柱，但除了張曉風的〈護井的人——寫范我存女士〉之外，並未看到較長的文字、報導或專訪，甚為可惜。在二月二十四日臺北紀州庵余光中特展開幕式時，幼珊特地當眾向母親致謝，令全場動容。

於是在行前兩天請幼珊稟報師母是否願意接受訪談，幼珊表示師母一定樂於此事，直接代為應允。

訪談當天我依約定時間來到高雄左營光興街余府，先請師母為我在臺北書展購得的《玉石尚》簽名。訪談於客廳進行，幼珊於一旁書桌校對老師的評論集遺稿《從杜甫到達利》，偶爾發言補充。訪談全長約兩小時，高齡八十七歲的師母耳聰目明，記性極佳，多年往事娓娓道來，諸多細節正可與我先前和余老師的訪談對照。訪談後師母特別出示一九五三年以英文簽名送給老師的 *Lust for Life*，只見因余老師譯作而名聞華文世界的《梵谷傳》，原書卻只比一隻墨水筆稍長，可能當初為了方便翻譯而將書拆開，泛黃的書頁顯現了歲月的痕跡，扉頁並有師母以英文小名「咪咪」贈書給老師的題字。此外，她贈送了我一本簡體字版的《老人和大海》及流沙河的論文〈詩人余光中的香港時期〉。

訪談結束後我分別以相機與手機拍照，也請幼珊為師母與我合照，母女倆請我到樓下吃飯，閒話家常，餐後並為我叫計程車前往高鐵站。由於叨擾甚久，我擔心師母體力，一再請回房休息，但她堅持到看我搭上計程車，那時已是晚上七點半，前後約四小時。訪談錄音經趙克文小姐繕打，張力行小姐初步整理並協助搜尋相關資料，我修訂三次後，送請余師母過目。師母不僅仔細修訂，使文字更為精練，而且唯恐列印稿上修改的字跡不清，除了保留四頁之外，以清晰有力的字體重抄了約六分之五，超過一萬字，對文字之敬謹與余老師如出一轍，令人感動又敬佩，謹此致謝。



*受訪者親自重謄大部分的訪談稿，並寫信說明。(單德興提供)

家庭背景與成長經驗

單德興（以下簡稱「單」）：首先請介紹一下你的家庭背景。

范我存（以下簡稱「范」）：我是一九三一年出生在杭州。父親名范尚岩，南京東南大學畢業，學生物。他後來留學法國，歸國後任教於杭州浙江大學，曾擔任園藝系主任。母親名孫靜華，十五歲就讀「江蘇省女子蠶桑專科學校」，該校副校長費達生是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的姊姊，母親受到費校長的影響改剪短髮。十九歲去日本留學，三年後回國，才和父親結婚。

單：你的名字很特別，據說和令尊留法經驗有關。

范：是的，我父親留學法國時，受到存在主義的影響，「我思，故我在」，就為我取名「我存」。

單：對自己的名字感覺如何？

范：很自豪啊，也是對父親的一種紀念。當然也有一點不好，讀書時，新來的老師看到這名字覺得好奇，就會抽起來問問題。父親在浙大的好友是貝時璋教授，後來成為科學院院士。¹ 那時張其昀先生也在浙大。

單：張其昀是中國文化大學的創辦人，當過教育部長。

范：貝時璋的女兒常和我一起玩。抗戰前，大學老師的待遇相當高，父親的薪資是一百八十大洋（即銀元），以當時物價來說，請客吃飯一桌常常不到一塊大洋。杭州的暑假非常熱，有一年父親帶我們去青島避暑。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戰那年，他帶我們去韜光山裏避暑，就是在杭州的北高峰〔按：韜光寺位於北高峰，「韜光觀海」為清西湖十八景之一〕。每天清晨，父親都會帶大家在山上散步。七七那天看見杭州笕橋空軍基地的飛機一架一架起飛——這是母親後來敘述的——父親說可能要打仗了，於是趕快下山，打聽消息，得知浙大計畫撤到貴州遵義。那時畫家林風眠在杭州創辦了藝術專科學校，父親和他都是留法的好朋友，家裏牆上掛著林風眠的畫，父親將畫卷好，藏在天花板上，戰後已一無所有。一九八〇年，文革之後，林風眠從大陸出來，定居香港，我曾去拜訪他，提起杭州，他還記得父親。

1. 貝時璋(1903-2009)，浙江省鎮海縣人，著名生物學家與教育家，中國細胞學與胚胎學的創始人之一，當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與中國科學院院士。

八月，我們開始逃難——詳細時間不記得了——只知八月間，從杭州搭火車到金華，當時只有這一段有火車，以後就開始步行，一路上常借住在農家或比較大的莊園，有好幾戶逃難的人家入住，孩子們常玩在一起。詳細的路線不記得了，我只記得一處叫蘭溪，一處叫建德〔按：兩地都在浙江，蘭溪位於中西部，建德位於西部〕。後來到了長沙，坐長江火輪到重慶，與外婆和幾位舅舅的家屬合住。那時已經是一九三八年，在路上逃了一年。

父親還是想去浙大，但貝時璋伯伯來信勸阻，說遵義非常潮濕，瘴氣很重，對父親健康不利，建議他去樂山武漢大學或成都華西大學。我們去到樂山後，一九三九年父親因肺病過世。由於江蘇蠶桑學校也遷到樂山，母親便進母校工作。我當年八歲，外婆從重慶到樂山來照顧我。

單：所以你小學是在四川念的，四川話也是那時候學的？

范：對。在樂山有兩次大轟炸。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八月，整條街被燒夷彈炸光。因為空襲的原故，我們搬往鄉下，附近鎮上有小學，是一所實驗小學，叫復興小學。當時錢歌川在武漢大學任教（後來曾任臺大文學院院長），他的兩個女兒也就讀那所小學。姊姊叫錢曼娜，在臺大和光中同班，有一次聽到我的名字，我們才又相認。她現在在美國華府。光中過世後，她打電話來安慰我，兩人也回憶了小學時的種種趣事。小學校長是女性，管教學生很嚴格，我們除了讀書，也有童軍訓練。上課相當有彈性，比方上午兩節作文，下午兩節自然或自修課，老師會把上下午的課對調，帶學生去爬山，教我們認識山間植物。如果是三、四月爬山，杜鵑花滿山遍野，還可以聽見鷓鴣鳥遠遠鳴叫。下山後，男同學到田裏抓泥鰍，大家就地生火烤泥鰍吃。回想起來，當時的教學非常活潑。老師們大半是師範學校畢業的，和學生的關係都很好。

單：你跟余老師是表兄妹，請問確切的親屬關係如何？

范：我的母親跟余先生的母親是同一個祖父，不同父親，她們應該是堂姊妹。

單：你跟余老師最早是甚麼時候認識的？

范：抗戰最後一年〔一九四五年〕，我小學畢業，考取了武漢大學附中。讀了一年，抗戰勝利，我單獨和母親友人回到蘇州，插班慧靈女中。母親則在上海中國蠶絲公司工作，經常出差。我的一位堂姨母在南京明德女中工作，建議我去南京讀書，可就近照顧，於是我便去了南京。一九四八年中秋前，有一天我去姨母的宿舍，見到一位陌生男子正和表弟講話，姨母說：「這是光中

表哥。」他穿了中山裝，站著打量我，隨後走過來，說：「來我家玩。」當時我年紀小，不知如何應對，絕沒想到八年後會和這個人共同生活六十一年。

單：余老師有沒有說過對你的第一印象？

范：我沒問過。隔了幾天，我收到一封信，是光中寄的。當時，他不知道我的學名，因為親戚都叫我「咪咪」，所以信封上就寫著「范咪咪」。我拆開看，是一張小報，上面刊登了一首翻譯詩，原作者是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單：余老師在接受我訪談時提到，他高中時很喜歡翻譯，曾跟一位同班同學辦了份小報，並以舊詩體翻譯拜倫的《海羅德公子遊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裏詠滑鐵盧的八段，譯後還寄給你。² 不知你接到時感覺如何？

范：當然覺得他了不起，因為我還是個中學生，只能看譯文。

單：余老師是從金陵大學，到廈門大學，再到臺灣大學，來臺之前還在香港待了一年。那你的情形呢？

范：我的情形很特別。一九四九年初，內戰已爆發，社會混亂，學生遊行、罷課，班上同學紛紛隨父母逃離南京。學校還未放假，姨母怕火車不通，催我先回了上海。有一天家裏來了一個表姊夫，他是空軍，本來前往蘇州擬帶岳母（我的表姑媽）去臺灣，但表姑媽不肯離家，表姊夫便回上海住在我家，問我願不願去臺灣玩一玩。那時大家對臺灣都不清楚。而我初二下學期因為肺病休學了一學期。母親說我既然不能插班讀書，何況表姊和姑爹都已在臺灣，去看看也好。於是第二天我就搭了轟炸機來臺灣，飛機上掛炸彈的地方都改放行李，我只帶了幾本教科書及簡單的行李。飛機到新竹，我先住在空軍宿舍，後來到臺北。姑爹是接收土地銀行的職員，因他曾留學日本，會日語，也算是農業學家。我們便住在他的宿舍裏。那時的臺北人口不多，晚上八點多衡陽街就沒甚麼人了。姑爹常帶我們去看顧正秋唱京戲。

單：是在中山堂嗎？

范：不是，在新樂戲院，應該是延平路那一帶。姑爹白天有時會帶我們逛植物園。母親有位同班同學，我稱她謝阿姨，常去拜訪，她先生是臺灣肥料公司的總

2. 根據余老師的訪談，「這是高三下學期的事」，參閱〈第十位繆思：余光中訪談錄〉，收錄於單德興，《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臺北：允晨，2014），頁 181-230。引文見頁 185。

經理湯元吉，曾留學德國。一九四九年五月，母親工作的蠶絲公司也撤退來臺，宿舍在臺北公館。同年政府安排失學青年統一考試，考完再分配入學，考場在和平中學，就是現在的師大附中。我被分配入一女中，插班初三下學期。班上二十八位同學，全是大陸各地來的，包括齊寧媛，即齊邦媛的妹妹。大家各講不同的方言，有人說上海話，有人說廣東話，我和有些同學講四川話。高一時，校長是江學珠，她原本是淞江女中校長，調到臺灣來。

單：後來你在照 X 光時發現肺部有問題。

范：對，高二時，所以便休學。那時母親的工作已轉往臺肥，我們便搬往基隆。

單：你的經歷真的很特別。曾經一個人搭火車去南京唸書，又一個人搭飛機到臺灣，這種獨立的個性來自母親嗎？

范：應該是。自小她就要我看報紙社論，瞭解社會狀況。又給我看俄國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傳記，認為女孩子不要學林黛玉，只會哭哭啼啼，要勇敢一點，不要自卑，碰到困難要設法解決等等。

因書結緣，以譯交友

單：余老師早期翻譯海明威的《老人和大海》和史東的《梵谷傳》，這些因緣與你密切相關。余老師是一九五二年夏天在府上看到《生活》週刊(Life Magazine)上一次刊完的《老人和大海》，也是在府上看到梵谷的畫冊和傳記。我好奇的是，當時臺灣對外資訊很封閉，府上怎麼會有這些書刊？特別是在當時的時局，怎麼會有這些關於文學和藝術的書刊？

范：我有一位表兄，是大舅的兒子，抗戰時自昆明西南聯大畢業，曾和楊振寧同學。抗戰結束，他去北京清華大學工作，寒暑假則到上海探望我母親。表兄雖然學的是物理，但對人文、藝術也非常喜歡，常鼓勵我聽古典音樂，介紹我看傳雷翻譯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貝多芬傳》(Beethoven)和《約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等等。一九四七年他去美國，進了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寫信問我在臺灣可以看到甚麼書刊，隨後就寄《生活》週刊給我，裏面往往介紹名畫，也有關於文學的資訊，所以余先生會在我家看到這本雜誌。

單：余老師當時常去府上嗎？

范：是。光中和父母是一九五〇年才到臺灣的，那時我和母親還住在臺北公館。

有一天，余先生和父母忽然來探望我們，他一見到我就說看過我的書架。

余幼珊：我要補充一句，我爸爸無論走到哪裏，只要有字、有書，眼睛馬上就會被吸引過去。

范：原來他們從南京撤退到上海時曾到過我家，見到我母親，並且看到我的書架。

所以他第一次來公館就對我說：「我在上海看過妳的書架，有新月派的詩集。」其實，我的書架上有胡適譯的短篇小說，徐志摩的詩集，俄國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的《貴族之家》(*Home of the Gentry*)和《羅亭》(*Rudin*)，還有《魯冰生漂流記》(*Robinson Crusoe*)等。臨離開時，他說：「我寫了一篇小說，下次給妳看。」第二次他去公館，就給我看那篇小說。

單：是寫哪方面的？

范：小說叫〈劉家場〉，大概是寫重慶悅來場的故事，是個愛情小說。我那時候跟他不熟，就說寫得好。後來他自己覺得不好，就沒有保留下來。

單：你們是講四川話嗎？

范：是。我們一開始就講四川話。後來他問我有沒有看過錢鍾書的《圍城》，說可以借給我看。一九五二年，母親到臺灣肥料公司基隆分公司工作，我因肺病休學在家，搬往基隆，光中便開始寫信給我。一年後我回臺北，光中已經臺大畢業，開始服兵役。那時，他才有機會看到《生活》週刊，也繼續翻譯英詩。當時臺肥公司的宿舍在中山北路，他常騎腳踏車來。除了《圍城》，我也看了錢鍾書的散文《寫在人生邊上》。《圍城》的時代背景和我父母那代很相似，看後感觸很深，光中稱這本書為「新儒林外史」。

單：他是怎麼跟你借《生活》週刊，還翻譯海明威的小說？

范：他第一次看到這篇小說便借回去，說要翻譯出書，當作大學畢業報告。

單：他的指導老師是曾約農，翻譯的過程你聽說過嗎？

范：他並未和我討論。他的翻譯曾約農老師評了八十分。過了一陣，他又看到《生活》週刊介紹梵谷。開始時他並不喜歡梵谷，於是我寫信給美國的表兄，請他寄點有關梵谷的資料，他就寄來兩本畫冊和一本 *Lust for Life* (1934) [《梵谷傳》]，我收到後送給光中。他看完這本書後十分喜歡，就去告訴梁實秋老

師，說他想翻譯。梁老師說：「這本書那麼長，你就節譯吧。」他後來跟我說：「我才不要節譯，要全部譯，不過你要幫我抄稿。」我就答應了。

單：張曉風的〈護井的人〉中特別提到，余老師那段時間跟你通信，紙的一面是《梵谷傳》譯稿，另一面是情書。

范：他要我抄稿，所以信就寫得比較勤，那時我在中壢，教幼稚園。

單：根據張曉風的文章，余老師譯稿出來後，寄去請你抄，你抄好後寄給他，他再送去《大華晚報》，連載了將近一年。³

范：因為《老人和大海》在《大華晚報》連載時，讀者反應不錯，主編耿修業先生對光中印象甚佳。其實，後來他還翻譯了毛姆(W. Somerset Maugham)的小說《書袋》(*The Book-bag*)，也是我抄稿，在聯副連載，不過沒出單行本。

單：《老人和大海》署名「光中譯」，這篇也是嗎？

范：用「余光中」。

單：由於年代久遠，研究余老師的人，可能並不知道他翻譯過毛姆。

范：因為沒有出單行本，只在報紙上連載。⁴

單：《聯合報》和《大華晚報》，一個日報，一個晚報，都是當時很重要的媒體，能在上面連載，很不容易。請問你們兩人合作的細節如何？

范：那時翻譯書較少，《梵谷傳》故事性很強，又和現代繪畫有關，所以讀者很多。我買了一大疊五百字或六百字的稿紙，幫他抄，十分愉快，一面抄，一面閱讀。

單：為甚麼會答應幫忙抄稿呢？

3. 根據余光中〈九歌版《梵谷傳》新序〉：「我的譯本完成於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六日，邊譯邊刊，在《大華晚報》上連載〔按：自次年一月一日起刊出〕，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刊畢」(12)。該書由重光文藝出版社於一九五六年十月與一九五七年三月分別出版上下冊。

4. 毛姆原作收錄於《阿金：六篇故事》(*Ah King: Six Stories* [London: Heinemann, 1933])，頁164-219。署名「余光中譯」的《書袋》自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至三月七日連載於《聯合報》「聯合副刊」，扣除星期日(二月十六日，二月二十三日，三月二日)與農曆年假(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總共十九日。



*范我存送給余光中的《梵谷傳》與扉頁題字（右上）。（單德興提供）

范：他說，這是我們合作和感情的紀念，同時我也好奇，想知道梵谷的畫為何影響未來的畫家。

單：余老師的稿子改得多嗎？不然為甚麼要你幫著抄？

范：其實他的譯稿改動並不多，但是他在白報紙上橫寫，而報館刊登是直排，為了避免發生錯誤，必須重抄。

單：當時余老師在國防部服役，上班的地點是總統府。我記得余老師在訪談時提到，他自願留營一年，讓我覺得很驚訝。

范：原因是他覺得那個工作並不繁重，有時間做自己的事，同事間相處很愉快，何況還未決定教書的學校。

翻譯家是如何煉成的？

單：余老師先前在訪談中提到，預官第一期招考一百位翻譯官，他考第一名，而且他大學時代在翻譯方面便已嶄露頭角。

范：我覺得他這一生，寫作和翻譯是環環相扣、互有關係的。他念臺大時，趙麗蓮主編《學生英語文摘》，有一次譯詩比賽，他得了第一名。夏濟安老師和吳炳鍾老師都十分鼓勵他。譯《梵谷傳》的同時，他也在《學生英語文摘》上譯英詩。退役後，夏濟安老師便邀他去東吳大學代課。

單：大家在談「余光中」時，因為他在詩歌和散文方面的成就太耀眼了，以致多少忽略了他在翻譯方面的成就。其實就如你所言，余老師開始創作的時候，翻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范：那是很重要的過程。他大四時已出版了詩集《舟子的悲歌》，是豆腐乾式的格律詩，受到一些英詩的影響，並不成熟。翻譯《梵谷傳》時，正好美國新聞處（簡稱「美新處」）要把美國文學推廣到臺灣和香港，必須找人翻譯。香港的宋淇〔林以亮〕看到光中的譯詩，非常欣賞，便透過夏濟安的關係，開始和光中通信，請他譯美國詩，資料由吳魯芹先生提供。

單：林以亮編選的《美國詩選》，其中的詩人介紹一半以上是余老師寫的，譯詩也有將近一半是余老師翻譯的。雖然出版時譯者排序是張愛玲、林以亮、余老師和邢光祖，其實貢獻最多的是余老師。先前余老師接受我訪談時提到，在臺大外文系時教他英詩的是英千里，在大學時已翻譯了一些詩，一九六〇年集結成《英詩譯注》，由文星出版。他也提到吳魯芹幫著聯絡林以亮。

范：英千里、梁實秋這幾位老師的風範，對光中影響甚大。他曾有專文〈文學老院，千里老師〉悼念英千里老師，也寫過〈秋之頌〉來追思、頌讚梁實秋老師。

單：聽說梁先生妙語如珠，可惜我們沒有機會接觸。有緣接觸的余老師也是字字珠璣。你覺得他們兩人相像嗎？余老師是詩人，妙語可能更多一些。

范：兩人不太一樣，梁老師掌故較多，講起笑話來是冷面笑匠，聽他說起五四時代的文人十分有趣。光中則受王爾德(Oscar Wilde)和錢鍾書影響，喜歡正話反說。

單：剛剛提到《梵谷傳》初譯時你的協助，後來余老師修訂《梵谷傳》時，你們

已在香港。當時余老師開車送你去大埔買菜，利用等待的時間，就在車上改起稿來。大地出版社的修訂版在原先重光文藝出版社的初版基礎上改了一萬多處。

范：余先生覺得他對英文方面並沒甚麼誤解，而是中文有些地方不夠達意，所以修改。

單：那本書有二十多萬字，余老師的修訂就有一萬多處，工程非常浩大。你看過修訂稿嗎？

范：看過，他把重光版的書拆開，一頁一頁的改。可惜這些書頁已給大地出版社，我們自己沒有保留。

單：那麼修訂稿可能還在大地出版社，如果有保存的話。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有一篇碩士論文，比較前後兩個版本，指導教授周法高先生是中研院院士，專長為語言學。⁵等到《梵谷傳》修訂三版（九歌版）出書時，老師在前面加了梵谷的行旅地圖，後面也加了不少當時畫家的生平資料。

范：我為甚麼說光中的事業和翻譯脫不了關係呢？在東吳兼課時，有一天梁實秋先生問他：「光中，你想不想出國？」他回答：「洗盤子賺學費的話，我是不要的。」梁先生說：「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有個獎學金，我想推薦你去，假若你有意願，我就跟他們說。」他回家與家人商量後，就答應了。那是一九五八年的事。他去請教夏濟安老師，夏先生說：「不要去甚麼哈佛，你就去愛奧華州立大學安格爾(Paul Engle)主持的寫作班吧。」當年秋天，他去了愛奧華，安格爾看他已經翻譯了美國詩和臺灣當代詩人的詩，認為可以算一半的學分，另外的學分，他選了西洋現代美術史和美國文學。他在愛奧華時，遇到佛羅斯特(Robert Frost)，十分高興。一年後，他便拿到藝術碩士學位。

單：你可知道梁先生跟亞洲基金會的關係？

范：我不太清楚。

單：臺灣的吳魯芹、香港的林以亮都為美新處工作，美新處與亞洲基金會的關係很密切，都大力提倡中美文化與學術交流，提供許多書和資料給各大學，尤

5. 張嘉倫，〈以余譯《梵谷傳》為例論白話文語法的歐化問題〉，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未出版。

其是外文系和英語系。因為當時冷戰與反共的緣故，美國與臺灣的關係很密切，美方希望在臺灣推動美國文學和美國研究，發揮文化與學術影響力。

范：這些情況光中也不太清楚，因為梁先生推薦他，他就答應了。

單：朱立民老師也是接受亞洲基金會資助去美國的。

范：朱立民的太太〔黃紫蘭〕就在美新處工作。余先生在愛奧華時寫了一本日記，另外也寫信回來，日記現在在幼珊那裏，裏面寫到那一年在美國非常不習慣，尤其是飲食。他並不想用英文寫作，反而是選修的西洋美術史十分有用，老師是李鑄晉教授。也因為這個緣故，後來修訂《梵谷傳》時對西洋畫家非常熟悉。

單：余老師去美國不太習慣，是因為先前母親過世，家庭情況有變。

范：對，而且大女兒正好出生。

單：〈我之固體化〉那首詩就是描寫當時的心境……

范：對，他對於雞尾酒會之類的活動都很不習慣。

單：所以出去一年，拿到學位就回來。

范：他想要趕快回來，不想待在那邊。

單：於是就回到師大教書。

范：回來後，亞洲協會(Asia Society)在師範大學成立了英語教學中心。

單：林瑜鏗女士擔任過中心主任，對學生要求很高，訓練出許多英文方面的人才。余老師也就是在那裏教到田維新、周英雄、余玉照等人。因此余老師在臺灣英文學界的輩份很高，很可能僅次於大陸時代就在大學教書的那批渡海來臺的老師。

我很佩服老師在翻譯方面精益求精的態度，像是《老人和大海》後來出版修訂版《老人與海》，《梵谷傳》後來的兩個版本有許多修改、增訂的地方。最複雜的應該就是他的中詩英文自譯，最早出現在碩士論文改編出版的*New Chinese Poetry*（《中國新詩集錦》），一九六〇年由臺北的 The Heritage Press（國粹出版社）出版，收錄了三首自譯；一九七一年臺北的美亞出版公司(Mei

Ya Publications)出版的 *Acres of Barbed Wire* (《滿田的鐵絲網》) 整本都是英文自譯，總共四十八首；一九九二年出版英漢對照的《守夜人》，根據《滿田的鐵絲網》大肆增刪，收錄了六十八首，之後的第二版、第三版各間隔十二年，都有所增刪，巧的是都收錄了八十五首。這中間還夾了齊邦媛老師在國立編譯館任職時所主編的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1949-1974*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一九七五年出版，五人編輯團隊中，詩方面由余老師負責，他也翻譯了自己的九首詩和幾篇散文。我曾請助理把余老師所有的自譯詩詳細列表，可看出他一路的發展，也一直在修訂自己的作品。

范：《守夜人》每個版本也不同，後來拿掉了一些詩，也有新加的詩。

單：增刪的原因為何？

范：他覺得有些詩不夠好，不是翻得不好，而是詩本身不是那麼成熟，因此就拿掉了。

單：我曾專文討論余老師最早的譯詩集《英詩譯注》，那本書出版於一九六〇年，他當時三十二歲，不過裏面有些詩在大四時就譯了，發表在《學生英語文摘》。我看他的譯詩、註釋和評介，除了佩服他對詩的瞭解、韻律的掌握之外，也佩服他傑出的文采和認真的態度。⁶ 等到《守夜人》時，就覺得他翻譯自己的詩比較放得開，〈雙人床〉就是明顯的例子，那首詩余老師自己譯過，葉維廉也譯過。

范：那你覺得呢？

單：我仔細比較過，純粹就形式、句法、字面而言，葉維廉比較忠實，就用字的精簡、力道、氣韻，余老師更自由自在。尤其老師教英詩那麼多年，又是譯自己的詩，比較放得開。有趣的是，葉維廉翻譯自己的詩也比較放得開，但翻譯別人的詩就很守分寸了。你有沒有聽過老師特別講到自譯的部分？

范：沒有特別講到。不過基於對自己作品的瞭解，他會覺得自己的譯詩更貼近原意，別人的翻譯，用字等等可能不會完全符合他心中所想的。

單：我在論文裏提到，作者(author)有獨特的權威(authority)，可以大膽發揮，因

6. 參閱筆者，〈一位年輕譯詩家的畫像：析論余光中的《英詩譯注》(1960)〉，《應用外語學報》no. 24 (2015): 187-230。

為原意如何他理應最清楚。余老師在《守夜人》序言也提到，既是作者又是譯者，翻譯自己的作品應該不會有「第三者」來品頭論足吧。⁷ 最特別的一點就是，我先前的論文裏提到幾處中英文不一致，後來發現第三版有一個地方竟然直接改中文原作，這是只有身兼作者與譯者才有的權威或特權。⁸ 至於《英美現代詩選》是老師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作品，距離最初一九六八年的版本有半世紀之久，不知你從旁觀察到的情形如何？

范：《英美現代詩選》原先分兩冊出版，但余先生後來又陸陸續續翻了幾十首詩，我就一直催他，無論如何在有生之年要把這些合併起來，催了他好幾年。我說：「你再不動手，以後就沒有力氣來做這事情。」所以他就慢慢加進去。不過他會說：「妳每次都催我，妳知道這個工程是很浩大的嗎？我不是把詩翻出來就算了，還要介紹原作者、詩的特色等等。」我說：「我當然知道。」後來他對哈代(Thomas Hardy)很欣賞，又多譯了幾首他的詩。添加的過程中就要重新翻譯，深入瞭解作者的背景，介紹作者的生平和詩的特色等等。

單：據我所知，《英美現代詩選》最早的版本是一九六八年的學生書局版，分為上下冊，後來大林版也是上下冊，一九八〇年的時報版合併為一冊。

范：其實當時時報出版社的組織不太穩定，相形之下九歌很有條理，我就建議把書交給九歌，所以余先生的作品最後都由九歌出版。

單：你剛提到哈代，我發現原先《英美現代詩選》裏最早的英國詩人是葉慈(W. B. Yeats)，修訂版推前到哈代，哈代的選詩中那首〈冬晚的畫眉〉(“The Darkling Thrush”)其實最早的《英詩譯注》就收錄了。我很納悶老師的第一本譯詩集《英詩譯注》為甚麼沒有再出版，也覺得很可惜。

范：出版社的問題就是很不穩定，像學生書局，余先生幫它邀了好幾本書，包括他學生翻的東西，到後來不清楚怎麼回事，這幾本書就沒有了。

單：《英詩譯注》最早是一九六〇年由文星出版。

7. 參閱筆者，〈含華吐英：自譯者余光中：析論余光中的中詩英文自譯〉，收錄於單德興，《翻譯與脈絡》(臺北：書林，2009)，頁 205-236。自譯與葉譯之比較見頁 224-231。

8. 《守夜人》第二版(2004)把〈野砲〉中的「百年後」譯為“After fifty years”(頁 78-79)，第三版(2017)直接把「百年後」改為「五十年後」(頁 73)和「半世紀後」(頁 75)。



*《英美現代詩選》的不同版本，(由左至右)大林版(1970)，時報增訂版(1980)，水牛版(1992)，九歌增訂新版(2017)。(單德興提供)

范：文星關了以後就移到學生書局、大林等，後來就亂掉了。同時，有幾年他在國外，無法再關注出書的事。

單：余老師有篇文章提到自己的作者、學者、譯者「三者合一」的身份，也多次提到自己文學創作的四個面向：詩歌、散文、評論、翻譯。請問你對余老師身為詩人、散文家、評論家、翻譯家有甚麼看法？

范：當然他自認以詩為主，可是我滿欣賞他的散文，無論是文字、主題、鋪陳都跟別人不太一樣。詩的話某些地方比較隱晦，不是那麼容易看出真正的內心想法，要多讀幾遍才會比較瞭解。而且寫詩跟時空背景也有關係，比如說，有些人很欣賞他的詩，可是對詩的理解未必那麼透徹。四川的流沙河有一篇文章討論余先生香港時期的詩，就寫得非常透徹。因為流沙河經歷過文革、經歷過中共種種的運動，所以他一眼就看出來余先生詩裏的背景，跟真正要表現的東西，這些是在臺灣的人看不出來的。⁹ 所以講到最近的一些事情，譬如說他寫〈狼來了〉，有它的時空背景，是在臺灣的人領會不到的，但流沙河一眼就看出來，馬上知道它的思想內涵及對政治的看法。

我們在香港住了十一年，中間有一年（一九八〇至八一年），余先生休假回到臺灣師範大學，很高興。我留守香港，間中回臺，因為還有女兒在港讀書。他在香港最初三年教書很順，可是當地的政治氣氛左傾。香港有份《新晚報》，做的是統戰工作，主編羅孚無論學問、素養都很好，對中國文化也瞭解，只是政治看法偏頗。光中初到香港，《新晚報》就寫：「余光中來到大陸後門，

9. 流沙河，〈詩人余光中的香港時期〉，收錄於黃維樑（編）：《璀璨的五采筆：余光中作品評論集(1979-1993)》（臺北：九歌，1994），頁 134-167。

歡迎回來看看新中國。」可是我們在中文大學住久了，發現周遭的人，比方校車司機、工友、菜市場賣菜的小販等，很多是從深圳偷渡到香港的，甚至有些學生的親屬仍留在大陸，知道那裏的物資非常缺乏。光中開始寫詩批評文革，如〈公無渡河〉、〈小紅書〉等，因此，左派文人開始批判他，加起來有幾十萬字，光中一概不理。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情況才轉變。一九九三年春天，大陸改革開放多年，中文大學舉辦了一場兩岸作家文學研討會。在大會上羅孚先生親自宣佈，向余光中、夏志清、顏元叔三位先生道歉。當時齊邦媛、林文月、張大春等學者、作家都在場。

我們在香港時，臺灣的過客也不少，像是林懷民的舞蹈表演，林海音、何凡夫婦每年去開新聞會議。齊邦媛、殷允芃、痲弦夫婦、洛夫、羅門、何懷碩、王文興夫婦、林文月、張曉風等，都先後到過香港，光中常開車接送。楚戈去時，我們帶他去郊野公園，事後他畫了兩張畫，並且題字送給我們。

守護與自持

單：你和余老師結婚超過六十年，鸞鵲情深，而你大力支持老師的文學志業。張曉風形容你是「護井的人」，黃維樑則形容你是「護泉的人」，請問你個人的看法如何？

范：很感謝他們兩位溢美之詞。婚前我們來往六年，兩人成長背景差不多，都經過兩次戰爭，也有共同的興趣與話題。他對我說，這一生只想當作家。既然寫作、翻譯、教課是他人生的目標，我就幫他完成。公公和婆婆也無異言。家中瑣瑣碎碎的事，由我承擔。當然他一生也遇到多位貴人，如果沒有梁實秋老師的提攜，他不可能順利到大學教書。

光中在國防部當翻譯官時，薪水每月八百元，公公在僑務委員會工作，薪水是七百元，他們三分之二的薪水交給家用。光中生活很簡樸，大半的衣物都由我們為他購買。全屋子的中心就是最大、朝南的那間房，書櫥最多，是他的書房，他樂在其中。

單：余老師當時離開政治大學，到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我在中山大學圖書館余光中特藏室，看到當時中文大學副校長以毛筆寫給老師的邀請信函，連待遇都寫得清清楚楚，顯然比臺灣高很多。

范：當時政大的薪水一個月是臺幣七千元，中文大學的薪水一個月是港幣七千元

〔按：副校長信中寫明月薪為七一八〇港幣〕，當時港幣兌臺幣的匯率是一比五。而且中文大學的管理非常上軌道，老師不能在校外兼課，更不兼行政，只專心研究和教課，每年有兩個月的休假，可出國找資料等，從講師到教授都有這項福利，在臺灣只有正教授才有休假。因此，一九八〇年，光中在中大已七年，可以回師大任教一年。

從政大轉往香港中文大學，並非完全是薪資的關係。一九七三年春天，香港「詩風」社邀請余先生去演講。劉紹銘教授在中大崇基學院任教，順便請余先生到崇基演講一場。事後宋淇先生（校長特別助理）和聯合書院院長邀余先生見面，表示聯合書院中文系需要一位教現代文學的老師。宋先生對余先生的中英文翻譯早就十分瞭解，也知道余先生對中國古典文學並不陌生，大力促成余先生前往中大任教。對余先生而言，從英文系轉至中文系是一大挑戰。一九七四年八月便全家赴港，達十一年之久。

單：除了全力支持夫婿，你自小就對藝術有興趣，後來喜歡攝影、欣賞古玉、編中國結，也到高雄市美術館擔任義工導覽，請問你如何既照顧家庭，又發展自己的興趣？

范：這些興趣是慢慢發展出來的。當然，年幼時常聽母親輩的友人談論詩詞藝術等，多少會有影響。在臺北時，故宮成立博物館，常有機會觀賞古文物，對玉器情有獨鍾，到香港才有機會收藏。至於繪畫藝術當然是因為抄《梵谷傳》而更感興趣。至於對音樂的興趣，是從大表兄送我唱機及唱片引起（當時是手搖唱機，黑膠唱片）。光中也很喜歡藝術，他第一次赴美，住在宿舍覺得很寂寞，便買了唱機、唱片，聽了許多古典音樂。光中第二、第三次赴美，我和孩子一年後才和他團聚。光中喜歡開車，每去大城市，一定參觀美術館、博物館。在香港中文大學時，有文物館，每次特展，我們也一定去參觀。何況在臺時，光中常幫「現代繪畫」鼓吹，畫家、詩人常來家中，如何懷碩、席德進、羅青等等。

一九八四年暑假，光中答應李煥先生的邀請，決定於一九八五年回臺。那時幾個女兒已長大獨立。光中便建議一九八五年我們夫婦二人去歐洲旅行，前往法國、西班牙及英國。為此，他自學西班牙文一年，在西班牙和英國都是自己開車。印象派(Impressionism)的畫當然在法國最多。在西班牙則看哥雅(Francisco Goya)、葛雷柯(El Greco)以及達利(Salvador Dali)等等。旅行中我會攝影，以備光中寫遊記時參考。



*《玉石尚》為范我存結合古玉與中國結之作（左），多年收藏於高雄新思惟人文空間展出（右）。

單：你喜歡攝影，記得曾經你攝影，老師配詩。那是一九七〇年代嗎？

范：不是，那時我們已經回到臺灣了。一九八六年南部攝影家王慶華先生為墾丁國家公園拍攝攝影集，請光中配詩。王先生也是高山嚮導，對南部非常熟悉，因此，我也帶著相機，看到特殊的景色便拍下來。有一次《婦女雜誌》的編輯看到，想刊登我的攝影，我並不覺得自己拍的照片有多好，但編輯說很好，並希望余先生配詩，光中也答應了。

一九八〇年後，女兒都已長大，我有空間發展自己的興趣。我對玉器一直十分喜愛，至於收藏的古玉，在形制和價格上我認為合適的才會收藏。中國文字中有許多成語和玉有關。從出土資料中得知古人常佩玉，藉此與天地之神相通。既然如此，何不古為今用，為古玉配上節飾，使之可配戴，有如將千年的光陰追回來？於是我開始學編中國結，並為自己收藏的古玉配飾。

一九九八年，高雄市美術館成立，有一次展覽趙無極先生的回顧展，朋友約我看展，館方正招募義工導覽，朋友和我就去報名，經過考試通過，便在高美館服務了十九年。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挑戰和自我成長，也是口才訓練。有些展覽我也會和光中討論，甚至他會幫忙畫地圖。

單：是的，我記得第一次上英國文學史，老師一進教室就在黑板上畫地圖。

范：如果要介紹西洋畫家的一些經歷，走過哪些地方，我就會多準備一點資料，有地圖給觀眾看，比較有趣。

單：你跟老師討論繪畫，有沒有刺激他寫一些詩？

范：並不多。

余幼珊：還是有喔，像大衛像。爸爸也寫過龍門石窟的盧舍那佛像。

范：有一次在高美館展出文藝復興時期米開朗基羅的複製品。我們曾在佛羅倫斯看過大衛原件，我就跟他分析雕像的比例和表現方式、用的工具等等，他就寫了一首長詩〈大衛雕像〉。此外，他還寫過俄國畫家夏戈爾(Marc Chagall)。

單：他在詩裏面也寫過你，從早年、中年到晚年，不曉得你的感受如何？

范：最早時比較淺，太露了一點，後來就比較含蓄。我當然很感動。

單：比較晚期的詩蘊藏的感情很真摯，包括面對老年的情境。

范：面對生死的問題。

單：你們之間有沒有特別談過對生死的看法？

范：並未太深入的談過，我主張一切順其自然。我曾希望他念一點佛經，譬如《心經》或《金剛經》。他喜歡觀世音菩薩，更喜歡文殊菩薩，一直想寫一首有關文殊菩薩的詩，只是蒐集的資料不多，未能寫出來。

單：為甚麼會希望老師念佛經？

范：我個人覺得基督教太強勢，好像沒有迴轉的空間。家裏《聖經》和佛經都有。光中教英國文學，常會遇到《聖經》中的典故，如米爾頓(John Milton)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和唐恩(John Donne)的宗教詩。不過，他並未因教詩而信其教，反而在讀佛經時內心較平和，對死亡有超脫的感受。這種感覺無法用幾句話說清楚。我曾對光中說：「你這一生，想做的事，大多如你所願，雖有風浪，皆平順渡過，沒有太大遺憾。」光中離開我們已逾百日，願他在天之靈仍祝福我們。

單：謝謝師母接受訪談。

范：不客氣，很高興跟你聊這些往事。